

安裴智◎著

——中国文艺批评家、  
作家访谈录

# 多面折射的 文化光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安裴智◎著

——中国文艺批评家、  
作家访谈录

# 多面折射的 文化光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 / 安裴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203-0453-5

I. ①多… II. ①安…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5294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  
插 页 2  
字 数 376 千字  
定 价 13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 媒体优势与批评精神

贺绍俊

认识安裴智有二十多年了。我们的相识是缘于共同的职业，那时候我在《文艺报》社做编辑，安裴智在《太原日报》社做编辑。《太原日报》是一份地方综合类报纸，时政新闻是其重点，但安裴智与报社同人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做文学的文章，他们为报纸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双塔”，由著名作家冰心题写刊名。安裴智负责“双塔”副刊的文学评论版，一干就是十年。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来北京组稿，我也成了他的作者对象。没想到后来我们又有了同样的经历：离开媒体进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我去了沈阳师范大学，安裴智去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他现在是该学院人文学院的副教授。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安裴智现在虽然是大学的教授，但他不会像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那样乐于将自己的思想关闭在校园里。多年媒体工作的训练，使他有了一颗开放的心，从而即使从事学术研究，也能够让现实的风雨飘洒在学术研究的平台上。他的又一部体现其学术特点的著作《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即将出版了，他希望我

为此写一点文字，我欣然答应，因为我从他的著作里也看到了自己学术经历的痕迹。

学术研究，通俗地说是做学问。做学问是很苦的事，有一个词是形容做学问的，叫作皓首穷经，意思是为了学问头发都白了却依然在穷尽对经典的钻研，这就是做学问的境界。真要做到皓首穷经，就不得不摆脱外界的各种干扰和诱惑，两耳不闻窗外事。难怪有人说，只有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才能做出大学问。“象牙塔”因此也就成了人们指责专家学者脱离现实的词语。然而不得不承认，学术研究的确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科学性。但当代文学比较特殊，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许需要具有更多的现实热情，因为当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太密切。当代文学本身就是文学现实的构成，处在不断向前延伸的动态发展中，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曾有学者以此得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从一般学术研究的特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把当代文学当成学术研究对象的话，就难以摆脱现实的干扰，因此必须等待当代文学在时间的推移中沉淀下来，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变得如此的谨小慎微，应该有勇气迎接现实的挑战，学术研究为什么不能直接以现实为研究对象呢？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已经成了一门重要的学科，当代文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既是对研究者的极大挑战，也是激活研究者创新精神的主要媒介。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独特的经验和方法。比方说，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一方面，许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是当下文学实践中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学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文学批评家转身去做当代文学研究，也做得风生水

起，成绩斐然。安裴智就属于后者。

安裴智曾经在文学实践中摸爬滚打，他做媒体副刊编辑，组织并直接参与了很多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比如，1995年2月，他在北京大三元酒家，举办京城文化名人“双塔”副刊组稿会，著名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王蒙、丁聪、方成、黄宗江、唐达成、刘心武、何西来、牧惠、舒展等参加。同时，他又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文学现实发言。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做了充分而又独特的积累和准备。他最早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守望与突进》，应该还是他在媒体工作期间的成果，正如已故当代文学学者何西来先生在其序言中所说，从这部评论集中可以看出安裴智的学养。他说：“一般来说，培养一个批评家比培养一个作家需要更长的周期，其中的学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书读得不多，没有雄厚的知识积累，没有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鉴别，你就很难对一个作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如果说，作家、艺术家可以是学者型也可以不是学者型，那么，一个好的评论家，就必须是够格的学者，至少也应该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以为，安裴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自觉的，他的不少文章都体现出程度不同的学理性。”因此，安裴智后来转向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媒体的经验和思维习惯不仅没有成为他职业转向的阻碍，相反倒成了他的一种优势。他曾直接参与文学现实的经验更有助于他在学术研究中有效地处理当代文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是安裴智长期以来先后对数十位文艺家进行访谈的结集。文化访谈，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批评形式，其兴起离不开媒体的推动，这种批评形式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有效地将媒体优势与批评精神沟通了起来。安裴智90年代初曾在一家媒体精心打造文学批评园地，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很

早就采用了访谈这一新的批评形式，并深谙其特点。访谈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话。我们的时代从对立和对抗走向了对话，这是一种文化的进步。文化访谈的应运而生正说明了文学批评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安裴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最早掌握了访谈这一新的批评形式，而且还在访谈中深刻体现了对话的精神。当然这得益于他在学养上的充分准备，他具备了对话的能力。从这些访谈中可以看出，安裴智首先能够敏锐地抓住文化热点，确定访谈的主题。同时能够发现热点背后的学术要点，通过对话导引出访谈者的学术见解。因此安裴智的每一篇访谈都具有文化内涵和学术深度，不少访谈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权威刊物《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转载。从这部文化访谈集中，可以看出安裴智具有鲜明的媒体人的思维方式。媒体人的思维方式首先突出体现在新闻敏感性上。其次，他能将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取各自的长处，并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所以，即使现在安裴智是一名大学教授，从事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我更愿意将他视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一名打通了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隔膜的文学批评家。

安裴智的学术实践让我们对中国的媒体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媒体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就是建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媒体是孕育中国新文学的母体。当代文学批评自然也离不开现代媒体的支持。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媒体的，安裴智是在90年代初期进入媒体的。21世纪初，他又南飞岭南，进入深圳特区的另一家更大的媒体。可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从媒体上起步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媒体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不能低估，特别是进入90年代，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化处在一个媒体的时代，几乎一

切公共或个人的生存活动都需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文学更是如此，媒体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媒体批评的提法。后来媒体批评受到的攻击和贬斥多于对它的褒奖，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媒体批评基本上是站在媒体的立场而非文学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立场与文学立场是难以统一协调起来的。但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就发现我们对媒体与文学的关系的判断是充满偏见的，至少对媒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所谓媒体批评，是指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对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进行评说的文章。媒体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大概也就是21世纪前后的事情。媒体也对文学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需要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权威面貌、理论色彩和评判立场，但支撑这一切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却被阉割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媒体的实际利益。随着国内媒体大战，媒体批评迅速发展起来。媒体批评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文学批评变成了公众化的角色，而另一个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误解，以为炒作最厉害的媒体批评就是媒体批评的全部，因此也就对媒体批评持强烈否定的态度。殊不知，中国当代的媒体具有其复杂性。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统一在市场法则下。但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它影响到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中国媒体的许多奇怪现象就是由于受制于双重法则而产生的。但在双重法则面前，由于运作机制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就会有偏重于市场法则或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中国的媒体，特别需要区别对待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大众媒体是文学的敌人，小众媒体则是文学的亲密朋友和合作伙伴。中国目前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还有专业性的文学报纸，如《文艺报》《文学报》，它们的发行量一般都很小，只能说是小众媒体，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真正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不是那些大



众媒体，而是这些专业性的文学报刊。我们对媒体进行了这样的区分，同时也就意识到，不同媒体上的批评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不应该以媒体批评的概念笼而统之地抹杀其区别。因此，我将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为时尚化批评，而将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是建立在消费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它抢人眼球，热闹轰动，但它不触及文学的实质；它会影响到大众的文学兴趣，却不会影响到文学性的消长。实质性批评是建立在精英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它静悄悄地出现，甚至出来就被人遗忘，但它触及文学的实质，它能揭示文学的走向、弘扬文学的精神价值。安裴智可以说是小众媒体批评群体中难得的一员，他曾经工作过的媒体并不处在文化中心城市，要坚守实质性批评更不容易。安裴智不仅坚守了，而且还将一个非中心的小众媒体做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

安裴智的批评实践和学术实践是很特别的，他以自己的努力融洽了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同时又勾连起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如今他又将媒体的现实敏锐性和现场感带入了学院派批评之中。安裴智既然已是大学的教授，按说应该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但我更希望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批评上，因为他做的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他有多方面的优势，如今又站在学术的平台上，一定会给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动势。

2016年10月3日于北京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曾任《文艺报》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 序二

# 学术访谈的价值

傅书华

在中国当前的文化生态及公众的精神生活中，学术访谈是一种特别值得给予提出并加以强调的文体。

学术访谈是一种学术文体，也是一种新闻文体，学术性与当下性是这种文体的基本属性，用学术性来支持对当下学界或公众所普遍感到困惑的社会问题的深层解说，是学术访谈的功能与效用；被访者是对所谈及问题领域的权威学者，形成了访谈的权威性，并因了这种权威性而构成了对所谈问题解说的公信力。对所访谈问题的当下性，则使这一访谈在时间的流动中，成为了历史长河的一部分，使其具有了史料性，并由于时间维度的引入，在现实空间的四维存在中使这一访谈虽然已时过境迁，但仍不失其现实性的存在。

安裴智的《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就是这样的实例，这样的一部学术访谈文集。

这部文集采访了 30 位学者与作家，涉及文学、艺术学、美学等领域，时间跨度为 1995 年到 2010 年。



对 1995—2010 年人文界热点问题的敏锐对应，是这部文集的一个显著特点。譬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争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红楼梦热、张爱玲热、散文热、“韩流”热、国学热、名著改编热、狼文化热、诺贝尔文学奖热等；对俄苏文学、“80 后”作家群体、深圳青年作家群、海马影视创作室、深圳水彩画创作等文化现象的及时评价；对贾平凹、莫言、王安忆、池莉等著名作家的尖锐指责，等等。这些访谈，在当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与现实作用，又给 1995—2010 年这 15 年间中国的人文界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让后人得以一窥这 15 年中国的人文生态，一窥这 15 年中国人文界的历史进程。

譬如，对蓝英年先生的访谈。苏联文学曾经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共和国文学。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子夜》及 20 世纪 50 年代的“百花文学”就是苏联文学直接影响下的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解冻”后的文学状况多年来不为中国公众所知，但伴随着历史反思大潮的到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尤其是，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苏联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历史进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使苏联“解冻”后的文学对中国公众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极强的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蓝英年先生是国内研究苏联“解冻”后文学状况的首屈一指的专家，正是通过对蓝英年先生的访谈，通过蓝英年先生在访谈中对索尔仁尼琴的介绍，使国人对苏联“解冻”后文学的思想价值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也让我们在今天看到了昔日苏联“解冻”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积极意义。再譬如，“韩流”是 21 世纪影响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重

要文化现象，一集不落地收看并争相议论长而又长、似乎永远距离结尾遥遥无期的韩剧成为当时中国强劲的文化时尚，“茶发”在其时的中国更是流行一时。可以说，其时的“韩流”在实际生活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塑形。裴智对马相武关于“韩流”的访谈，对此作了清晰而又深入的学理说明。确实，当中国完成了从政治革命转入经济建设的历史转型时期，个人性的日常生活就成了中国大众最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并因此把日常生活审美性提到了时代价值范型转型的高度，以日常生活独树一帜的“韩流”正是因此而被中国大众所狂捧。之所以是“韩流”，是由于时尚文化总是为经济的发展程度所限定，从文化高位向低位流动，韩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性、日本文化形象的“脱亚性”等，又促成了“韩流”在中国的兴盛一时。再譬如，改编名著曾在21世纪之初红极一时，裴智对张德祥的访谈，对中国古典名著、现代文学名著、红色经典的改编热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时至今日，让我们有机会得以回顾当时的文化景观。

这些访谈，不仅给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化进程留下了时代性刻痕，而且在今天回望过去时，仍时时提醒着我们那在历史进程中新生的历史可能萌芽性地存在，开阔着我们的文化视野并引发着我们今日的反思。譬如，中国今天的文化生产力从价值形态考察，主要由1930年、1950年、1980年这三个代际群体构成，随着20世纪30年代生人在今天实际文化生产中的淡出，占据今日文化生产主力位置的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群体，以及生命形态、人生经验、价值构成与中国市场经济同步生成的20世纪80年代生人群体，这两部分人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生产的主要力量。在历史性的时代转型中，新的年轻一代往往会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五四时代即是明证之一。只是今天中国的“80

后”一代，还仅仅是“浮出历史地表”而没有形成引领时代的相应空间，但20世纪50年代生人与20世纪80年代生人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因此具备了丰富深刻的历史性内涵。因之，作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的白烨对20世纪80年代生人的评价，就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存在价值。譬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特区，自有可以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对话的前沿性先锋性，这种前沿性先锋性，在深圳青年一代中，在作为时代最为敏锐的感受形态的文学中，有着更为鲜明的体现。如是，李敬泽在访谈中所提出的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地图，从而对深圳青年作家群予以充分定位与肯定，就值得给予特别重视。李敬泽的这一看法，已然在现实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对这一看法进行深入全面的阐发在今天仍不失其现实的迫切意义。再譬如，在今日中国日益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及文化生产的市场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中，如何看待“狼性”，如何看待名噪一时且在文化生产市场化方面取得成功的“海马”影视创作室的经验，都是未完成的话题。

这些访谈，不仅在话题、内容、观念上构成了我们今天得以重新认识的“史性”价值，更因为被访谈的人是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在细节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对过去岁月的认识更具有血肉的丰富性，这是学术研究文章所难以具备的。譬如，通过对周汝昌的访谈，不仅让国人得以明了“红学”的价值之所在，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其时中国“红学”研究的进展状况，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红学”权威的周汝昌进入“红学”领域的具体情境，看到了构成这一情境的种种细节，这些细节是研究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所不可缺失的，也恰恰是我们以往研究历史所常常忽视的。

访谈中的历史性真实，还需要访谈者对访谈对象有充分的尊重，

即不以自己的观点对所访谈对象的观点作任意的压缩，以为历史存真，让后人得以看到其时学界各种不同的主要观点及争论所在。譬如，就我所知，安裴智在救亡压倒启蒙、文学的主体性等方面的观点、见解与被访者王朝闻先生就有着极大的分歧，但这并不影响访谈中王朝闻先生意见的充分表达，且王朝闻先生的观点作为一方代表，自有其历史价值之所在。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一页风云散”，如何看待历史风云人物的自我表达，如刚刚过去的历史时代政治风云人物的回忆文字，在访谈中对一个时代的个人言说，成为我们今天应该给予特别重视及科学评判的问题。这些言说，尽管其中不乏因不可避免的自我辩护而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真实存在，是有着其独特的历史真实的价值的，这在今天的访谈工作中尤其需要特别指出。

如是，这样的学术访谈就有了极高的学术含量与文化含量，有了较强的现实作用与历史意义。做这样的访谈，需要访谈者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人文文学界的热点问题有着良好的敏锐感受，同时又有一定的学术水准，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做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如此，才能对所需要访谈的问题有着准确的判断，才能选准访谈的对象，也才能在访谈中有能力不断地引申问题，形成对话。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学术访谈这样一种学术文体形式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学术论文有越写越艰涩晦奥的趋势，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用各种概念绕来绕去，这其中体现的是言说者主体的缺失，是概念成了外在的言说者。学术访谈，直接针对问题发言，言说主体鲜明、明白如话。不是说学术论文也要写得浅显易懂，但学术访谈主体性的“在场”、学术访谈的文风，对校正目下学术论文写作艰涩晦奥的弊端，我以为不无益处。我还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学术访谈让学术研究走出象牙之塔，将



学术界的成果传播于公众之中，用学术解说解公众精神之困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中国学术本来是有关心社会、改造社会的优良传统的。比如明末至清的硕儒顾亭林、章太炎、康南海、梁任公等人，是很重视学术的经世致用的。民国后，学术在动荡的乱世中为构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学术走向社会，却又曾一度很畸形地滑向了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学界思潮引领着社会思潮，影响着社会生活公众生活，学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尖兵”。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学界注重自身“岗位”建设，却也日渐疏离于迫切的社会现实问题，疏离于中国大众的现实问题精神生活，更有甚者，甚至转向注重书上作书，对学问的实际应用性多有看轻，学界的学术论文、著作数量虽然成倍增长，但大众的精神生活却依然因为失去了必要的思想性精神资源的支持与引领而日益流于苍白平庸。面对现实问题，价值观念动荡、浮躁、不知所往成为今日中国时代的精神表征。注重学术的应用性，用学术性提升大众文化大众精神，是今天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且颇急迫，而学术访谈则是学术思想界将自身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精神生活资源，并参与现代社会生活构建的最值得重视和倡导的学术文体之一。

裴智是从报社转入高校任教的，我以为这其中有着他独有的优势：见多识广、视野开阔、知识结构博杂，且对变革高校的人文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与作用。高校的人文教学本应与社会现实有着血肉的联系，并因此使高校的人文教学有着活水之源的滋养。但目下中国高校的人文教学似乎有着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的苗头，越来越成为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不能将知识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不能实际地作用于社会人生，且将学术的应用性与学术水准作不应有的对立。报社作

为新闻媒体，与社会现实水乳交融、无法切割，裴智从报社转入高校，其强烈的现实人文情怀与介入学术的角度、方式，正是他在高校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优势所在，这本《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学术访谈集，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学术成果，是他成功转入高校人文教学与研究的一个证明。

但我对裴智也有着新的期待。这本学术访谈集证实了裴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学术能力，他在访谈中所涉及的问题是那十五年间中国人文学界的重要问题，受访者又多是该问题领域的领军人物，其所表达的观点，是那一时代一方一派的代表性观点，如果裴智用文笔优美的学术随笔的文体，结合这些问题，结合这些受访者及其所表达的观点，系统地说明或阐释一下其时的人文语境，并对这些问题、受访者及其观点作出自己的评析，我想，那一定是一本非常受公众欢迎的、有相当学术含量的学术著作，且这类学术著作也会给我们现在比较沉闷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接收现状，吹来一股清新之风。我衷心地期待着。

谨以为序。

2016年10月13日于太原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文学院院长，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名作欣赏》副总编辑，著名文学评论家）

### 序三

## 重温思想涌动的文化涛声

张德祥

读安裴智这本《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它把我带回到世纪之交的特定文化环境中，刚刚过去的一幕幕文化景观如在眼前，距今也仅十来年光景，但又有些恍若隔世。确实，这十来年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兴起之后，思想文化传媒领域的各种八卦层出不穷，耸人听闻、虚张声势，唯以“抓人”为目的的“标题党”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把人的精神带入了碎片化、感性化、粗鄙化，以阅读量、点赞量为衡量标准，“文章”也一惊一乍起来了，魂不守舍、装傻卖萌、瞒天过海。回过头来读这本批评家、作家访谈集，文字是那样平静舒缓，似促膝而谈，娓娓道来，诚恳而真切。是的，这里的访谈，是谈思想，谈思考，谈艺术，谈文化，谈精神，谈问题，谈天道人伦意境，所以有一种纵深感、辽阔感，有一种灵性与觉悟。虽然这里的观点我未必全都认同，但每一位受访者的态度都是认真的，都是严肃思考后的表达。杂志与报纸，是阅读，是理性，是思考。杂志与报纸的出现，实际上伴随着